

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

SW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散文选集

黄秋耘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 黄秋耘散文选集

姚玳玫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黄秋耘散文选集/姚玳玫编.—3 版.—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6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部分)

ISBN 978—7—5306—5391—3

I. 黄... II. 姚...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3469 号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2 字数 218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5.00 元

## 序 言

姚玳玫

### 一

我总认为，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的那一代中国作家是很独特的。他们多数曾真诚地把社会理想和艺术理想合二而一，他们首先是一个“虽九死犹未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他们大都经历了一个文学的非同寻常的年代。从四十到七十年代，作家被赋予了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任务，即对革命事业只有维护、辩护的义务，没有质疑、批判的权利。他们一方面

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操守着心灵深处的良知和人道精神。他们在一条窄小的夹缝中谨慎而执著地作着文学的运思。黄秋耘属于这一代作家中的一员。

带着时代的强烈印记，黄秋耘，这位半生戎马半生翰墨的长者，从他拉开文学生涯之帷幕时起，就显示了他的“知”与“情”兼胜的禀赋。作为一个早年投身革命、一九三六年十月就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他有清晰而理智的人生信仰：

四十年来，即使当我痛苦得几乎难以活下去的时候，我也从来不后悔四十多年前选择了那么一条道路，在铁锤镰刀的党旗下宣誓入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因为我坚信，人类社会最后总会沿着这条道路走向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这个世界是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没有等级的差别，在法律面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巴黎公社”的原则明确规定了的。

（《风雨年华·简短的结束语》）

他理解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人道的、民主的，没有等级差别的大同世界，他坚信共产主义事业本身是正义的，代表人类的良知与真理。这种信仰与他的另一面的气质——以人道情怀为核心的诗人气质相通相合。后者是一种悲天悯人的诗人气质，它以善良为底色，以敏感地体察人生人情为内容，以汹涌澎湃的情感喷发为形式。知与情、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在一种人道精神的统率下和谐地体现于黄秋耘的作品中。

有人称黄秋耘是一位“丁香花下的老兵”，丁香花的幽香浪漫与老兵的忠于职守，两种格格不入的人生态度，竟奇迹般地共存于他的身上，形成其所谓知情兼具的禀赋。这种禀赋使他的创作获得了一种感性与知性兼长并美的特点。可是另一方面，残酷的现实生活又常使他陷入感情与理智相矛盾相冲突的痛苦中。他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老兵都难以走向极致，他既以其诚挚的感情对于周围的人世有着一种不能自己的关怀，又以其所接受的人生信仰去面对周围的罪恶，在痛苦的煎熬中炼就一种坚定的人生观。这双重气质从

不同角度规定他必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纯情可纯情至陶醉于丁香花丛这么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他的理智可理智到拿刀拿枪投身革命试图重新创造一个新世界。情感上保存一个虚幻的天堂与现实中的积极参与，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追求一种崇高完美的人生境界。

而他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在诗人与老兵双重气质的规定下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内涵和光泽。他擅长于散文，既有“风花雪月”般的潇洒，又决不耽于“风花雪月”——那只是他一个遥照现实的梦，即使他对这个梦流露出某种向往，也不会以之作为麻醉剂去粉饰严酷的现实。老兵的身分更使他清醒而勇敢地直面现实人生，用他的笔去作“带血带泪”的倾诉。他的散文有“血泪文章”之称，那确实是他生命历程中一块块独具意义的路碑。

## 二

战士与作家双重身分的合二为一，并非是黄秋耘个人的现象。在中国近现代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面对内乱纷争，列强蹂躏，抗战救亡等残酷

严峻的现实，假如对社会有一定良心和责任感，有那么一股热血的话，谁都可能自觉地选择战士的角色，自觉地投身于改造旧中国的行列。这几乎是这一代人，一代作家的必然选择。

黄秋耘的人生经历与他的文学经历是互相辉映、互为对应又交叉重合的两条河流。没有前者也许就没有后者，或者说，后者纵然存在也可能是另一回事。

### 1. “两栖”境遇

黄秋耘，原名黄超显，曾用笔名“昭彦”、“洛思”等。一九一八年十月六日出生于香港，原籍广东顺德。父亲是香港一家西药房的老板。这位受过西式教育的药房老板，一方面希望儿子能继承父业，当一名医生或药剂师；另一方面又对子女采取比较自由放任的态度，尊重儿女们各自的人生选择。在宽松的环境中长大，黄秋耘几乎是顺其自然地走上他的文学道路。他自幼受舅舅、南社诗人马小进和叔叔黄恕和的熏陶，养成了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中学时就读于香港一间爱尔兰人创办的学校华仁书院，又受西方文化的浸染。他曾沉迷于尼采、叔本华、济慈、罗曼·罗兰，又

特别喜欢屈原、李商隐、黄仲则、龚自珍等人的诗词。强烈的文学爱好使他一心想考进北平的清华、燕京等大学，在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等名师的指导下研究中国文学，并以之为终生事业。这一志向不久便成了事实。一九三五年秋季，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成为国文系一年级学生。

本以为，自此以后，他将与文学结伴终生。谁知日寇侵华的炮声打断了他的美梦。一九三五年的北京，强敌压境，战云密布，“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一切对于一个满腔热血、深怀爱国之心的十七岁少年，除了投身救亡斗争，别无选择。“一二九啊，我的起点！”那不仅是黄秋耘的人生起点，更是他的命运的起点。青年时期的经历、遭遇会决定一个人终生的选择。他参加了民先队，加入了共产党，在学生军训队亲历了“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抗战初期曾打入日本人设在香港的情报机关从事秘密工作。他还在国统区和法国殖民地广州湾开过书店，编过期刊，坐过监狱。解放前夕是解放军东江纵队的一名情报参谋。建国后他在新华社，南

方日报做过几年工作。直到一九五四年调到当时北京的《文艺学习》编辑部,才真正开始他那早已拉开序幕却一直无暇去创造实质内容的文学生涯。

倘若,黄秋耘遇上一个太平年代,顺顺当当念完几年大学,真真正正在诸多名师指点下漫游于文学殿堂,他也许会成为一名更为纯粹的文学家;倘若,黄秋耘能放弃他对文学的终生迷恋而专心从事革命工作,他也许会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但是命运决定他不论是走政治道路还是走文学道路都无法贯穿始末。而这种“两栖”境遇不能不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可以说,他是革命家中的作家,作家中的革命家,他一辈子几乎总在这种两栖的身分中寻找一条折衷的路子。他的散文曾被誉为战士的散文,其对文学的战斗性的过分信赖,一方面赋予他的作品以一种坚持正义、批判邪恶的浩然正气,另一方面,又影响着作家对文学自身作更为纯粹的探索和追求。“两栖”境遇奠定了黄秋耘散文的底色,对日后的“秋耘风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 2. 三个时期

黄秋耘的散文创作紧紧围绕着他的人生经历

而展开，也就是说，每一个时期作家独特的生活内容，人际境遇，情感经历，在他的散文中都留下很深的印记，以至形成其作品不同的格调。按此，大概可分为三个时期：

从一九三五年上大学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包括建国初期）为第一个时期。一九三七年初，黄秋耘在上海《艺文线》上发表处女作《矿穴》，以后又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报告文学、散文和杂文。那是一个“少作”期。高涨的革命热情与年轻人纯情、天真、幼稚、冲动的天性相交织，形成这个时期的风格。从现存不多的作品来看，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写人叙事的纪实性散文，一类是议论抒情性随笔。前一类明显带有解放区文学的特点，多从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角度，写下层人民的生活。如《矿穴》、《两个擦鞋仔的故事》、《吴深的悲剧》等。尽管这些作品尚不成熟，却已显示黄秋耘散文的主要特点：一、在强烈的责任感的照射下作品的思想内容极为突出。反映不平人生，鞭挞黑暗社会，是这个时期作品的主题；二、笔调深情细腻，对苦难人生充满人道主义式的关怀；三、散文创作是作为一种革命事业的

副产品与作家结缘的。

建国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为第二个时期。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又充满困惑的年代。建立新中国、“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政治经济领域掀起的一个个浪潮，直接波及意识形态领域和文艺领域。中国知识分子尚未来得及享受新生活便已卷入一个又一个“运动”，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洗礼”。那是一个强调政治与文学合二为一的时代。面对一派充满善意粉饰、天真向往、浅薄歌颂的虚假的“升平盛世”，作家们表现了不同的姿态：有的欣然投入，有的露出疑惑、痛苦的神色，有的持严肃认真的批判态度，黄秋耘属于后者。他为人作文的良知感在这个时期尤为强烈，他曾为之出生入死所换来的理想世界竟是这样充满缺陷！不过，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并没有挫伤他去创造新世界的满腔热情，他凭着“女娲补天”式的虔诚和执著，开始了一种“自我批判”——对他所信仰的社会主义的弱点与缺陷的批判。《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了灵魂的悲剧》、《创作和批评的障碍》、《犬儒的刺》、《史笔》等杂

文随笔,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他“满怀激愤地对当时已见端倪的思想僵化、压抑人才,以权谋私等不正常的现象进行了抨击,对那种‘粉饰生活的怯懦心理’和反现实主义的‘虚假的美,装腔作势的美’进行了批判,呼吁作家们要和人民同甘共苦,同歌同哭,要警惕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对我们事业的危害。”(宋遂良《血泪文章战士心》)

文章犀利尖锐,活泼而自信。由于当时环境的相对稳定宽松,对人生信念的坚定乐观,这个时期作家的精神个性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那是“秋耘风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其特点有:一、保持社会批判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任务的一贯风格,文学对现实的干预性得到认同和强化。二、写人叙事的纪实风格渐渐转化为议论性的个人抒怀,个人色彩、情感色彩大大增强。行文锋芒毕露,直抒胸臆,坦荡明朗,痛快淋漓。三、现实的悲剧性情状深化了作家的思想,使作家的人生信仰、思维方式和人品气质在一次次“洗礼”中获得升华。

新时期以来至今是黄秋耘创作的第三个时期。如果说从一九三五年进入清华大学时,黄秋

耘已叩响了文学之门，而到了一九五四年结束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他方得机会走进文学殿堂，那么，其实是直至粉碎“四人帮”、进入新时期以后，他才真正在文学殿堂中大显身手。

这是黄秋耘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是硕果累累的时期，也是他的散文创作抵达高峰的时期。本文对黄秋耘及其散文创作的论述，正是以这一时期为主要“摹本”。

### 三

黄秋耘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和他所接受的那种文学观念的盛行期并不完全同步。他的同代人把文学干预现实人生的信念付诸实践是三十、四十年代至五十、六十年代的事（文学为政治服务实际是这种信念的派生物），而那时，他虽也从事创作，却还处于“业余”的阶段。待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粉碎“四人帮”，拆除了一些精神枷锁、人的心身在某种程度上获得释放的时候，他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此时他的文学创造力空前旺盛，一泻

千里，不可抑制。他现已结集的散文作品百分之八十产生于这个时期。他幸好赶上了晚班车——文学为人生的宗旨在伤痕文学时期再一次得到张扬，关注当下人生的现实主义手法得到最广泛、最有深度的应用。黄秋耘的代表作：《丁香花下》、《雾失楼台》、《荒原上的“狼群”》均产生于这个时期。

把黄秋耘的这些代表作放在当时“伤痕文学”的背景下，无疑是引人注目且独具特色的。他既不同于五十年代崭露头角就被打成右派、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放鲜花”的王蒙、从维熙们，又不同于解放后出生的历经“文革”时期红卫兵武斗、又上山下乡务农的年青作家。较之他们，他有一种历经沧桑者的平静和藏而不露的悲哀。他选择了散文为表达方式，避免了因体裁的允许而不自觉地落入编造传奇的陷阱。他没有痛哭流涕，也不纠缠于某种具体的人生际遇，而是经由一种际遇展现在特定背景下人性中的善与恶生死较量的真实情状，他赋予这种较量以更普遍、更抽象的人生意义，而且，用一种平实而带抒情的散文笔调加以描述。在当时的一片声泪俱下控诉声中，

留下一种更为真实而充满意志力的声音。

## 1. 一切奔赴人道主义旗帜之下

对于黄秋耘来说，人道主义是一种情怀而不是一种理性话语。它是人类良知、正义感、爱、当下关怀等的总称和泛指，它把人放在首位，强调的是对人情人性的关注和守护。它是黄秋耘认识人生、体察人生的价值支点。成熟期的黄秋耘，各种人生追求都奔赴人道精神的旗帜之下。经过几十年的艰难调适，他一方面将战士的斗志和意志转化为一种人格力量，顶过了那个时代的风风雨雨，这使他至今仍为许多同志所由衷地敬佩；另一方面，他又将战士的心仪标示为一种永恒的理想：对平等、博爱、良善、美好的人生境界的呼唤和渴求。他带着他们这一代人那种九死不悔的朴实、天真甚至有些幼稚的热情，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这样一种人生境界。

作为抒情散文，《丁香花下》与《雾失楼台》可看作是姐妹篇。尽管它们描写的事情互不相及，它们的精神却是相通的。

把两个纯情而脆弱的牧歌式的故事，放在虽相隔半个世纪，却同样是人性受蹂躏的艰难年

代。背景的万马齐喑与人情的相濡以沫，在对比中形成强烈的反差。美的破灭是命定的，而对这种过程的渲染已把作家的人格境界和盘托出。

第一个故事发生于三十年代一个紫丁香盛开的季节，一对少男少女在反动军警追捕学生的恐怖气氛中奇异邂逅，她掩护了受伤的他，他们相约于丁香花下，彼此不知道姓名，只有朦胧的好感、隐约的依恋、恬静的交谈。丁香花下少男少女的情谊如诗似画，这段宛若来自天国的故事在日寇侵华、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只能以悲剧而告终，少年男女冷静分手了。美的逝去起因于对理智的服从——个人的感情服从于国家的利益。黄秋耘他们这一代作家笔下的人道精神，常带有“为集体谋利益”的色彩。

第二个故事依然纯情，却不浪漫。背景的冲突已由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从“内部”观照人性的陨落，这更为令人心魄悸动。这回不是写爱情而是写友谊，写老小三位“沦落人”在“知音”的互为发现中成了好朋友。精神上的相依为命、互相搀扶，使他们一度走出孤独的困境。谁知好景不长，一群面目可憎的时代帮凶